

走向现代化的抉择

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

MAKING

CHOICE

FOR

MODERNIZATION

走向现代化的抉择

——关于中国长期发展问题的报告

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责任编辑：王 林
封面设计：欧京海
版式设计：代小卫

走向现代化的抉择
——关于中国长期发展问题的报告
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6.25印张 146000字
1987年12月第一版 198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1000册
统一书号：4312·256 定价：1.50元

ISBN 7-5058-0078-7/F·67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1979—1984年：经济增长格局的分析	8
第二章 起点：新成长阶段的来临	17
第三章 制约：在双重压力下选择长期发展方式	41
第四章 主题：国民经济的结构变革	58
第五章 农村非农产业：推动结构变革的积极力量	87
第六章 区域经济：极不平衡增长中的整合	117
第七章 城乡关系：从隔绝走向协调	148
第八章 现代化与中国体制改革的求解程序	174
后记	191

导 论

0.1 在20世纪80年代，如何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纳入社会主义高度现代化的轨道，是中华民族面临的一场严峻考验。

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无数事实表明，如果不把农村的经济发展和进步放在一个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战略位置来认真对待，必将酿成历史性的重大失误。

提出问题的角度

0.2 本项研究是国家“六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重点研究项目。

本项研究的目的，是要提出并分析未来20—30年间中国农村发展中的重大战略性问题。全部研究着重于阐明在这些基本问题上我们可能做出的选择，以及不同选择的可能后果，以便说明这些问题对于国家在宏观经济管理、国民经济发展、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及其相互关系等方面已经选择或将要选择的战略方针具有什么意义。

在当代，人们的选择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会在更大的规模上影响着未来。这要求人们必须在相当的程度上，从急待解决的眼前问题中摆脱出来，认真地考虑更深远、更广泛和更长期的问题，以便确定它们对现行选择和政策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有没有深邃的长期眼光，能否正确地提出和分析长期问题，就直接影响着人们当前活动的质量。

格调与方法

0.3 需要事先说明的是,本项研究的内容不能当作是对中国农村经济乃至国民经济未来前景的规划和预测,我们也不希望它成为研究者自身主观愿望的一种表达。我们深信,未来不是宿命的产物,而是人类不断做出选择和进行创造性活动的结果。因此,我们力求对未来前景的各种基本可能性及其实现的后果作出分析和评价。当然,这样一种格调的选择并不含有对规划、预测或某种愿望的任何轻视。

0.4 在对未来的分析中,人们很容易受到两种极端作法的影响:一种是集中提出相互依存的关系,把被认为是主要的那些关系汇集于一个模型。这种做法在近年已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其缺点是,它只能提出一个过于简单的图景,而不能使各种不同的专家认识到他们自己的问题;同时,这个图景又过于一般化了,以致于很难为决策提供依据。另一种是凭借目前所能提供的大量专门知识(特别是技术和经济方面的知识)分析特殊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具体方面的问题从未被忽视,但它却不能使不同领域相互关系中的那些困难得到解决^①。

本项研究根据自己的目的,试图综合使用两种方法,从分析一些经过选择的特殊问题出发,通过历史的透视和有针对性的国际比较,结合国民经济的全局探讨中国农村的中长期发展问题,以求达到对特殊性问题相互依存关系的理解,进而对未来前景的各种基本可能性及其实现后果做出分析和评价。

所谓经过选择的特殊问题,从长期看,是指在包括农村问题在内的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中无法回避并持续产生重大影响的那样

^① 丁·勒逊等编著《面向未来》,中国科学技术翻译出版社,1984年6月版。

一类问题。

进行历史透视，是为了能够廓清我们进一步前进的现实基点，看清在历史过程中，我们解决了哪些问题，有哪些遗留下来仍需解决的问题，哪些是新产生而不可回避的问题。历史的沉积构成了我们进一步发展的约束条件，我们必须而且只能在这些约束条件下作出选择。

进行国际比较，目的在于借鉴各国成功的或失败的经验。我们将看到，即使对于同一类问题，各国也有着不同的选择。横向比较对于认识我们自己的问题，提高选择起点，扩大选择范围，评价各种选择的后果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了解别人的选择直接或间接地有助于我们的选择，尽管它们并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选择。

0.5 我们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对未来前景的各种基本可能性及其实现后果的分析和评价上，并不仅仅出自一种单纯的信念，也不是试图否认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和长期发展趋势。现代科学对动力系统的研究表明，系统在分支点附近，参数的变化能使系统进入不同的演进轨迹^①。人类系统在本质上就是这样一种动力系统的典型，人类的不同选择对参数的变化确有很大影响，而一个民族或国家进入不同的发展轨道对于今后进一步的发展又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目前就处在这样的分支点附近。

希望本项研究能为增强我们对可能实现的未来的把握能力，提高我们对难以预见的趋势的适应能力，多少起到一些推动作用。

① 参见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农村变革的系统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本书简介

0.6 全书共分为四个部分，主要围绕着长期发展过程中的国民经济结构变革和城乡经济体制改革这一对主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0.7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以论述“转折”为主要内容。说明1979—1984年我国经济增长的新格局，宣告了以满足温饱为中心的必需品消费阶段基本结束，揭开了以消费需求多样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为基本特征的新成长阶段的帷幕。面对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我国的国民经济和农村经济面临着一些新的重大选择。

第一章通过对1979年至1984年国民经济增长的分析，阐明了我国经济出现的一系列新现象。国民经济的整体特征开始发生变化，摆脱了以积累为中心的状态，转向以消费需求为主导。类似的调整效应在60年代初期也出现过，但此次大不相同的是，在调整过程中启动了对原有经济模式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在近年社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的近9个百分点中，约有5—6个百分点来自农村经济的贡献。初级农产品的超常规增长，构成了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动因，这是1979—1984年国民经济增长格局的一个基本特点。

第二章通过对中国收入水平、供求结构变化的具体分析和大范围的国际比较，阐明了正是近年国民经济增长，才使我国基本结束了以温饱为中心的必需品消费阶段。随着这个阶段的终结，继续扩大初级农产品和中低档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已不再能对国民经济增长产生那么重要的影响了。从今后的发展看，我国国民经济不可能再按1979—1984年的增长格局持续高速发展。未来国民经济增长的格局和速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找

到新的推进动因，形成新的产业结构来满足日益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我国国民经济正走向一个以结构大变动为主要特征的新成长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中，中国经济以及农村经济面临着一些重大选择。

0.8 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以论述“结构”为主要内容，说明产业结构变革是从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过渡的桥梁。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存在“选择”问题。我国经济目前需要的是：在既定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下，选择何种具体的长期发展方式或发展战略，以形成新的高效率的经济流程，从而完成结构变革这个历史性的任务。

第三章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特殊物质制约，对小康水平和现代水平的物质生产和消费做了简要的国际比较，指出中国经济要顺利完成结构变革和现代化，必须突破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方式。该章还指出，非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方式尽管目前还没有一种完整的形态，但它的胚芽已在世界各地悄悄地出现，它们为我们在长期发展方式上的转化、借鉴和选择提供了现实的起点和基石。

第四章将中国的经济结构状况比照于1965年101个国家的统计回归模型和16个半工业化大国的结构模型，指出我国原有结构问题的症结，在于结构偏差中国民经济的各个子过程之间极不协调，而不在于是否结构偏差自身。中国面临的经济结构变革决不是简单地将原有的某一结构偏差孤立地加以矫正，最重大的选择也并不是类似“轻型化”还是“重型化”、“高积累”还是“适度积累”这样单层次的问题。真正的困难在于，如何从我国的积累、消费、投资、生产、就业、分配、贸易等各个结构侧面已经存在的超常偏差出发，面对着向中等发达水平的过渡，建立起能使这些偏差具有最必要协调关联的新的经济流程。该章最后分析

了偏差协调战略面临的约束和出路，以及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流程的变化。

0.9 第三部分包括第五、六、七章，以论述“发展”为主要内容，表明：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为了完成结构变革这个历史性任务，不仅要在既定的条件下，通过选择具体的长期发展方式，形成新的经济流程，而且必须解决一些特殊的发展问题：如何有效地使大多数农村人口从农业中转移出来；采取何种方式整合极不平衡的区域经济发展；怎样打破城乡隔绝的状态，使其走向协调的状态；等等。这些基本问题能否得到合理而有效的解决，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

第五章指出，农村状况对于所有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水平过渡的发展中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大大提高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我国农民进入非农产业部门，绝不仅仅是农村自身发展的单方面要求，更深刻的推动力量蕴藏于国民经济结构全面变革的要求之中。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速度越快，规模越大，就越要同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变革联结在一起，这已成为进一步扩大我国农村非农产业的关键。不仅如此，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和体制改革都有着不可低估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该章最后提出了农村产业结构变革中的种种问题以及解决的方式。

第六章分析了新成长阶段所面临的极不平衡的区域状态与国民经济结构的关系，指出在天赋资源与经济要素、生产能力“双重错位”的条件下，不同类型地区以不同的增长型式去实现等级差异均十分明显的产业结构变革，构成了我国新成长阶段区域格局的一个总特征；因此，农村下一阶段的发展必将表现出丰富的空间结构色彩。然后，该章通过对需求等级差异与结构变动摩擦、区域经济同构与产业迁移成本、经济规模扩张与产业布局调

整这三个方面的分析，阐明了现有区域格局下的潜在发展机会，及其对不同区域农村发展方式的影响。最后，该章分析了我国今后区域格局的三种可能前景以及不同区域的城乡关系类型，提出了如何使农村发展中的空间结构生产力得到释放的若干有启发性的看法。

第七章回顾和总结了近代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的几次重大转折及其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指出自三年困难时期后，我国城乡关系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形成了城乡隔绝的格局，这一格局的凝固化对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然后，该章分析了农村改革与城乡关系的新格局，指出农村发展与改革的深入，大大提高了城乡相互依赖的程度，也使城乡的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化；在新成长阶段，我国的生产力布局和人口的空间布局面临着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为深刻的变迁。最后，该章分析了新发展阶段中城乡关系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提出了在变革中协调城乡关系的三条战略方针。

0.10 第四部分为第八章，以论述“改革”为主要内容。本章简述了国际现代化比较研究所表明的经验和教训，中国传统社会、现代化变革早期阶段及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现代化变革。通过对城乡经济体制改革不同基础的比较分析，指出了农村初步改革取得较大进展的根源所在，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由于受制于组织结构与城乡隔绝这两个基本的慢变因素，则难以取得相应的发展。该章分析了我们在进一步推进城乡经济体制改革时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又阐明了我们当前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处理这一阶段问题的着眼点。最后，本章分析了在既无完备的改革理论、又无清晰的目标模式，更无现成的样板以资借鉴，而又从事着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工作的条件下，应该如何积极探索和行动的方针。

第一章

1979—1984年：经济增长 格局的分析

1.1 1979年以来，以农村变革为发端，我国开始全面进入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新阶段。

1.2 近年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主要来自原有体制下累积起来的经济潜力的释放。

长期以来，平均主义“大锅饭”加重型结构，导致我国经济内部隐伏着两个方面的潜能：供给方面压抑着巨大的增产可能，需求方面潜藏着巨大的国内市场。到1978年，摆在人们面前的严酷事实是：能源紧缺，全国20%的生产能力闲置；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已难为有限的国力所承受；农业基础落后，相当大比重的农村人口处于温饱线以下；城市就业不足，2000多万劳动人口在到处寻找工作；整个国民经济“遭到巨大损失”。

这种局面的出现，理所当然地引发了建国以来国民经济的第二次大调整。类似的调整，60年代初期也进行过。但此次不同的是，调整过程中启动了对原有经济体制的改革。

常规性的调整加上体制改革这一新因素，有力地触发了两大潜能的释放。

1.3 1979—1984年6年间，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国民经济的整体特征开始发生变化。为更好地理解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增长的变化特点、及其形成原因，有必要对当时所面

临的局面及此前26年（指1953—1978年，下同）发展中存在的基本问题进行再认识。

一、强制平衡机制下的国民经济

1.4 新中国建立30多年来，我国经济在极其落后的基础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一系列深刻的问题和矛盾。国民经济过分偏重于积累，以及城乡经济的隔绝，就是这一历史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特征。

在消费和积累的关系上，消费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导向作用事实上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此后的三次国民经济扩张，无一不是围绕基本建设而展开：“156项”、“钢铁元帅”、“三线建设”、“22项引进项目”，依次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除“一五”时期外，消费水平的提高问题往往被人们抛到脑后。由此导致1953—1978年26年中，社会生产总值平均年增7.9%，而人均消费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2%（其中农村仅有1.7%）；城市主、副食品限量供应；住房紧张；1978年农民的粮食、油的人均消费量，比1957年还低^①。

在城乡关系上，多年来形成的分工格局是，城市负担建设和发展现代经济的任务，农村为这一任务的实现提供粮食、农产品、资金和劳动力；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受到严格限制。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无论是美国式的工农并举，还是苏联式的“掠夺”发展，农村经济都有一个单一化的过程。而之所以农村最终都能享受到工业化的利益，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存在着一个农村劳动力

① 本章中所用数据，除专门说明的外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版，或根据其中的数据计算。

转移和农村人口比重下降的过程。中国恰恰无法通过城市经济的扩张来大规模吸收农村劳动力，完成这一转移过程。1978年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由1952年的43.1%提高到72.2%，而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仍高达82.1%。

1.5 在上述国民经济的增长型式下，农村处于一种“贫困的强制平衡机制”之中。这表现在农村的三个基本矛盾上：

其一，狭窄的活动空间从根本上限制了农村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农村经济的内涵和功能日趋单一化，到后期几乎完全变成了粮食经济。中国人均不到两亩耕地，如果占人口80%的农民既不可能被城市经济所吸收，又被限制在“土里刨食”的狭小空间里，命运可想而知——人口的增长和收益递减的作用将抵消掉增产的利益。建国以来，我国粮食增产的速度是比较高的，而农业总产值增长很慢，农民收入增长得更慢，正是这一机制作用的结果。

其二，不恰当的生产关系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大锅饭”的体制下，干好干坏一个样，农民逐步失去了对生产的热情。

其三，“贡赋”过于沉重，加剧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困难程度。自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之后，国家一直通过低价购买农产品，从农村取得资金积累。这种方式一直持续了20多年，大约拿走了农产品商品量的一半以上。长期存在的沉重负担进一步恶化了农村的状况。

二、农村经济在改革中高速增长

1.6 1979—1984年间，农村经济全面高涨，出现了奇迹般的超高速增长。6年里农业总产值增长67.5%，每年平均递增9%；

粮食产量增长33.6%，平均每年递增4.9%；棉花产量增长180.4%，平均每年递增18.8%；油料产量增长127.1%，平均每年递增14.7%。在生产迅速发展的同时，农民收入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6年中农民人均收入增长166%，平均年递增17.2%。这种在较高水平基础上的持续超高速增长，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在世界上也十分罕见。

1.7 6年来农业持续高速度增长的实现，可以说是前述三个基本矛盾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解决的结果。下面我们围绕这一主题，分阶段对这6年的发展给出简单的描述。

1.8 1979—1981年，是打基础的3年。3年中，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达到年平均递增6.4%，比前26年平均年增3.2%快了1倍）；农民收入增长每年平均高达18.7%。更重要的是，这一阶段的发展，在物质和认识上孕育了一场农村经济的伟大变革。针对农村经济存在的基本问题，党调整了农村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加快农村发展的措施，收到了巨大的效果。

首先，采取农产品大幅度提价等措施，减轻农民的“贡献”负担，由此农民收入得到大幅度增加。除去提价本身对农业生产的刺激作用外，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大幅度增加农民货币收入这件事本身，就对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79年夏季开始，农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4.8%。通过这一措施，3年中农民收入增加450亿元以上，每年平均150亿元以上。这对改善农民生活起了很大作用。1981年农民购买消费品的金额比1978年增加89%，平均年增23.6%；农民人均消费增加29.1%，平均年增8.9%，为前26年年均增长1.8%的5倍。同期，农民购买生产资料数额增加18.3%；农民货币拥有量增加235.5亿元，增长幅度高达134.1%。这为生产的发展和后来包产

到户过程中农民大量添置固定资产提供了资金准备。农民收入的大幅增加，有力地从市场需求角度支持了国民经济调整。从1979年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加快消费品生产。198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1978年增加737.6亿元，其中农民占459.8亿元，为62.34%。由于在占消费品零售额一半的食品类中，农民购买量比重低于城市居民，故在增加工业消费品购买中农民所占比重提高得更快（大约占75%）。

第二，纠正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的倾向，大规模调整种植业内部比例和生产布局，积极发展非粮食作物的生产，在开拓农村生产领域，打破“贫困的强制平衡”机制上迈出了重要步伐。

3年中，粮食面积调减近8,500万亩，经济作物面积增加近4,700万亩，两者的比例由8.4:1下降为6.6:1。在粮田面积下降4.7%的同时，粮食总产量提高6.6%。经济作物的发展势头迅猛，作为长期老大难的棉花增产60%，油料则几乎翻了一番。这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也对粮食生产本身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调整农业的生产关系，各种形式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各地出现，并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1.9 1982—1984年，我国农村改革出现了突破，由此带来农产品奇迹般地增长与农村经济的全面高潮。1982年开始，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普及。生产关系的调整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3年中，农业总产值年增长速度高达11.7%，粮食和棉花年增长速度分别达到7.8%和27.0%，一举扭转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粮食紧缺的被动局面，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另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是商品生产出现新的高潮，出现农村非农产业蓬勃发展的崭新局面，它标志着我国农村经济朝着拓广农村生产领域，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新机制和城乡分工新格局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1.10 可以说，6年来农村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前述三个矛盾获

得不同程度解决的综合结果。没有提价因素，农民收入提高和生产增长都不可能那么快；但提价只是信号变化，若无农民可以对这些信号变化作出积极反应的体制和机制，单纯的信号变化不可能带来财富的涌流。农业生产关系的调整使农民恢复了发展生产的内在动力，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拓广农村生产领域则为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正是这三者的有机结合，带来了农村经济的大飞跃，并为农村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国民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1.11 1979—1984年，尽管是处于调整时期，国民经济仍在前期最高水平的基础上，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6年中，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9%，国民收入每年递增7.9%，速度比前26年高。按人均指标看，速度提高得更明显，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由前26年的3.9%提高到6.6%，提高了2/3强。

1.12 同样是高速度，格局却与前26年根本不同。最基本的差异是，国民经济在整体上摆脱了以积累为中心的状态，转向以消费需求为主导。

1979年以后，针对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徘徊难进的问题，国家采用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一方面，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安排几千万人就业，几次提高职工工资等措施来增加人民收入；另一方面，通过加快农业生产，对轻工业实行“六个优先”等措施，加快消费品生产，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在供需两方面的同时作用下，消费品生产迅速扩张，并带动起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扩张。农村经济巨变，城市就业增加，以及规模空前的住宅建设，都从不同的角度影响着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容和方向，并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格局。根据有关资料推算，在